

妇女劳动的理论建构

佟新

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何在？这是近 20、30 年来性别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一直寻求答案的问题。分析的视角很多，有从文化的角度，也有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但更多的分析是来自经济和劳动的角度。本文主要展示近 30 年来西方社会学对妇女劳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研究。

一、妇女劳动理论建构的意义和主要研究方向

在各种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中，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各种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皆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和家庭起作用。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角度分析和理解女性从属地位的产生是社会学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根源的重要入手点。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女权主义的各种理论流派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提出挑战，明确指出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缺少性别研究的视角，特别是缺少把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社会分层与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视角。因此，自 70 年代起，社会学界和女权主义的各派理论开始从性别角度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和阶级不等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是：1. 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何作用于或建构了两性不平等关系？2. 历史上，尤其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劳动的性别分工状况是怎样的？这种性别分工如何使妇女历史性地处于弱势地位？3. 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具体表现是怎样的？4. 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何作用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私人领域的劳动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劳动分工是如何相互作用的？5. 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何影响女性的性别认同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脉络。

近年来，妇女劳动理论建构的主要脉络是把阶级结构加入到性别研究中，通过分析阶级结构、种

族关系来透视社会性别。1975—1977 年曾任英国社会学会主席 (BSA) 的英国社会学家 S. 艾伦 (Sheila Allen)，在其代表作《性别分工和社会》(Sexual Division and Society, 1976) 和《工作和婚姻中的依赖与剥削》(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Work and Marriage, 1976) 以及一些相关文章中指出，社会学的阶级分析框架中缺少了妇女的位置，性别分工的所谓自然秩序没有被视作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建构而得到应有的研究、分析和置疑。因此在学术界有关阶级结构的社会分层理论一直视人口中的一半为一种边缘状态，妇女很难被视为真正的“挣工资”的人。艾伦认为，阶级理论没很好地加入家庭这一概念。加入阶级概念的家庭理论的假设是：1. 家庭是阶级的单位，家庭是最有用和最合适的阶级分析的概念；2. 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从他们的男性亲缘关系中获得他们的阶级位置和地位。3. 妇女依赖于相关联的男人。这些假设可以具体化为许多社会学的方方面面。^①阶级分析的研究视角提出女性是否具有真正的阶级独立性的问题。帕金认为，女性不具有真正阶级的独立性。因为女性拥有的资源和报酬并非完全取决于她本人的职业，而是她父亲或丈夫的职业。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源自于家庭，她们所属的家庭地位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而家庭的地位又主要视男性家长的地位而定。现代社会，女性的自我认同是透过家族一员的身分实现的，也就是说，女性所处家庭的身份似乎远比身为女性的地位来得重要。^②总之，妇女劳动理论建构的意义在于从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入手，把性别研究置于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和建构中，拓展性别研究和妇女研究的视野。

二、资本主义和妇女的劳动： 一些基本理论

1. 经典理论：劳动的性别分工和私有制

从劳动的视角分析两性不平等的起源，源自于恩格斯。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首次从劳动的角度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指出私有制产生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④在恩格斯看来，私有制产生之前，男性的生产劳动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但随着母系氏族的进步，采集慢慢变成种植，捕获的猎物开始驯化豢养，农业和畜牧业的时代开始了。性别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由此引发了社会运作方式的变化。恩格斯描述了妇女从自由、平等、有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演变为附属的、依赖他人监护的妻子或被监护人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畜群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分儿……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如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又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妇女工作性质的改变使家庭和社会的分离，家庭成为约束和压迫妇女的机制。私有制使男人合法化地、永久化地拥有财产权，而妻子作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出现了地位的永久性丧失。恩格斯理论的两个要点是：1. 社会公益劳动使男女成为社会性公民，男人的私有财产确立了他在家庭和社会里具有高于妇女的地位。2.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随着男性私有制、交换性生产以及阶级社会的发展，妇女的地位变成从属性的、家务性的。

对于两性平等关系的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⑤只有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才能达到社会性别的平等。

2. 二元制理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在70年代女权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无论是批判还是批判性地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经由这种反思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开始形成。

首先，70年代末出现了“二元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相互作用，共同产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女性屈从地位。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迪·哈特曼。

海迪·哈特曼(Heidi Lo Hartmann)曾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下属的“妇女就业和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和“技术和妇女就业研究会”主任的职务。她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性别的工作区隔”一文中指出：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妇女的平等之路是要既反对父权制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她看来，两性不平等是一种性别等级关系，妇女受压迫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或私有制；另一方面是父权制，它既是具体的关系制度又是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父权制的基础是对妇女劳动的控制，阻止妇女接近生产资料。在这种意义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按照性别的劳动分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性别的劳动分工具有等级制，反映了父权制的主要特点。在这种等级制中男人在上面，妇女在底层。妇女的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根源于按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⑥

哈特曼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资本主义利用了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结合，从四个方面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第一，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按照经济学的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自由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制度形式，当所有的人成为平

等的劳动力时，妇女和儿童也将获得同男性一样的劳动力市场地位。但事实是，男人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男人为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分化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表现为低工资，而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低薪迫使妇女结婚。女人似乎可以把自己无力买到的东西和生活方式，通过嫁人、通过从属于男人而实现。第三，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即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第四，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合法性，使妇女只能从事半日工作或不工作，这又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于地位。就这样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制度长期互相影响的结果，它使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恶性循环。综上所述，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特曼强调男性工作和数个世纪以来父权制社会关系的作用。

3. 性别分工同阶级的范畴同等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又称为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许多女权主义者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指出，性别冲突是人类冲突最基本的形式，是所有其他冲突形式——其中包括阶级冲突形式——的根源。^④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 W·Scott）讲，“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换言之，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⑤在劳动领域，这一理论认为，妇女从事那些维持和再生产工人的无报酬劳动，虽然这些劳动与有酬劳动一样重要，但它却导致了父权制和阶级结构对妇女的压迫，这种压迫并非是阶级关系的副产品。因此实现性别平等不仅要废除父权制，还应当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从父权制中受益，因此资本主义在制度、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中支持父权制。

80年代初，哈特曼的二元制理论面临了许多挑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父权制？父权制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有机联系的？艾里斯·扬（Iris Young）以“超越不幸的结合”为题，对二元制理论进行了批判。她认为，二元制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种简单的结合，它

既不能完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发展女权主义。关键的问题是要清楚他说明父权制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的动力和矛盾以及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妇女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压迫妇女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传统马克思主义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但阶级的概念是性别盲，用阶级的范畴来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是于事无补的。但是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把分工范畴提高到与阶级范畴同样重要的地位。分工作为分析范畴比阶级范畴更具体、更宽泛，是分析参与劳动活动并从这种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性别分工是各种分工中的一种，它涉及到在社会劳动的各种结构中的性别差异。性别分工是人类的首次分工，在原始社会，性别分工是唯一的制度化分工；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才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对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分析在于探索制度本身怎样依性别原则确立。艾里斯·扬认为，把妇女推向边缘，并使妇女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妇女起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的阶级作用。资本主义并不是利用了父权制来产生等级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它就是建立在规范男人主要、女人次要的性别等级之上。^⑥总之，资本主义体制内存在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特有机制。

1974年，萨克斯（sacks）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妇女难以通过参加有酬劳动获得成为“社会成人”的机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为男性对于资本家统治的服从给予了补偿。这种状况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加强了资本家的统治。^⑦近年来，女权主义者看到，劳动力市场中性别间高度隔离，妇女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爱森斯坦指出，资本主义支持了父权制或男性霸权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这种压迫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妇女对家庭的责任又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⑧也就是说，男性工人阶级不仅从家务中受益（妻子处于经济依赖地位，为丈夫提供免费的家庭服务和顺从），还从劳动力市场受益（获得高报酬的工作）。妇女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不得不依赖于有较

好收入的丈夫，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她们获取较高的收入。妻子对丈夫经济收入的依赖又加强了男人对饭碗的联系，弱化了男性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意识。

海伦斯·萨菲奥蒂 (Heleith Saffioti)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规定了劳动力在市场并非是均等的，并不是所有潜在的生产者都可能被雇用，它要求被雇用的人数在比率上有所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要求是要确立某种标准，以便区分主要工人和次要工人，那么性别成为划分劳动主次性的最自然标准，资本主义同样利用了种族标准。^①

4. 世界体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拓展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理论及依附理论。沃尔德 (ward) 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通过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经济渗透降低着妇女的地位，并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加恶化，导致了人口增长、贫穷和收入的不平等。她认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妇女作为家庭成员在男性“家长”参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同时，也纳入了世界经济体制，不能忽略妇女在全球经济中的直接作用和她们对处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大量关于妇女与发展的文献论证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男女不同的影响，妇女在发展中受到了损害。而这些发现常被世界体系论者忽略，他们相信家庭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沃尔德 (Ward) 强调，贫穷国家的妇女在食物供应和一般经济事务中具有关键作用，但对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状况的理解必须放入已经存在的“父权制关系”中，这种关系包括意识形态，男性霸权的体制化。边缘国家男女间新资源和新机会的分布状况深受西方 (男性的) 资本家有关性别预设的影响。她认为，边缘国家接受外国投资和对核心国家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与性别不平等水平相关。^②

三、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性别

1. 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性别不平等

70、80 年代的女权主义明确把劳动组织中的宏观和微观范围与不平等联系起来。并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首先提出性别不平等的分析框架。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性别 (gender in the labour market) 分析力求解释为什么妇女具有较低的经济地位。这一理

论认为，要从经济的连续过程来认识社会性别差异，尤其是两性的收入差异。这一理论有两种主要的分析角度。一是从劳动需求的角度，表现为由于各种“偏见”和歧视引发的两性虽然具有同样的生产率，但男性获得高于女性的收入，这是需求方面的歧视 (demand-side discrimination)。二是从供给的角度，它是先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如教育上的歧视和家庭因素，这些因素改变着工人的特质，使雇佣者在市场上无能为力，这被称作供给方面的歧视 (supply-side discrimination)。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从这一理论出发，如果性别不平等是由于雇佣不公平或机会不平等的话，那么通过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率也是难以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性别隔离导致两性收入差距。联合国的调查表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女性劳动者都比男性挣得少，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三。地位低和薪水低的双低工作成为女性工作的特点。在美国男女即使从事同样的职业并具有同样的资格，女性收入的中位数仍远低于男性，女性的平均收入不到男子平均收入的五分之三。^③因此，关键应当改变不平等的性别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因素。

2.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隔理论

1976 年，芭瑞恩和诺瑞斯 (Barron & Norris) 指出，女性劳动力服从于资本主义各种调节市场的法则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分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所谓初级劳动力市场是指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技术专长的人组成的劳动力市场。而女性被局限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次级劳动力市场对妇女是隔绝的，她们无力改变处于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地位。^④

劳动力市场分隔的概念源自于种族研究。但女权主义者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种族隔离，而且在劳动力市场还存在性别隔离。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表现为两性间存在着职业类型、收入差异的制度化距离，劳动力依照性别分为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从工作内容看，性别隔离导致了职业上的女性集聚 (female ghettos)，产生了所谓的“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女性的工作涵盖了秘书、办事员、小学教师、幼儿园阿姨等服务性行业，这些工作是典型的低收入、

少升迁机会、协助男子的工作。也就是说,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一种有形的区隔,职业类型被制度化地隔离在为男性的工作和女性的工作,由此女性的劳动在结构上显得不如男性重要。

另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到,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妇女处于较低工资的职业地位,它迫使妇女必须依赖家庭和丈夫,同时,也迫使妇女无力反抗低薪状况和各种被解雇的风险。

3. 女性的工作价值被严重低估

波拉克克(S. Polachek)认为,两性报酬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女性的工作价值被严重低估,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间断工作的女性,其收入更是被严重低估。因为根据人力资本的理论,妇女由于生育等家务性劳动必须间断她们的工作,而这种间断导致她们荒废了各种技术或原有的技术被淘汰。因此,在职业选择上,女性常常选择那些可以间断的工作;而男性没有此种顾虑,结果,那些可间断性的工作的价值也被低估。^⑤萨尔尼(Zellner)提出职业差异主要源于最初工资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别。人力资本的理论假定,与最初工资相关的是有关人力资本的投入。她指出,女性的最初工资并不比男人低,但是妇女在某一职业所从事工作的时间不足以获得足够的补偿;而男性工作的时间较长,他们很快会增加足够的经验并超过女性工资的增长率。^⑥上述观点表明,两性就业的连续性导致了职业的性别分化,同时强化了两性选择不同结构的职业,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职业所具有的性别分化。

英格兰德(Paula England)提出,是否存在着所谓的“男性工作”和“女性的工作”呢?而那些所谓的“女性工作”是否可以被定义为那些被严重低估了工作价值的职业呢?她进一步分析了职业的性别构成,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很清楚地解释这些现象,而是应当从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方面进行解释。^⑦Natalie Sokoloff曾认为,“低薪职业和低薪行业的双重成长是女性受雇人数成长的主要原因。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如此。这种状况深深地影响女性生活,较低的劳动报酬使她们必须依赖男性。”^⑧男女要实现劳动领域中的平等,首先要获得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否则无法改变女性在求职、收入、发展等方面的劣势地位。现代高新技术的应用,似乎应当有利于消除两性在劳动中存在着的体力差别,但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在科学进步

的条件下,劳动领域中被削减下的人大多是妇女。

4. 职业生涯的性别分化

所谓职业生涯是指个人在工作生命周期中期待及追寻的某种职业发展。职业生涯的性别分化理论主要研究在职业发展上两性的差别以及原因。毫无疑问,劳动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等级秩序,并充分表现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的性别等级化方面。在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女性总是处在较低的位置,女性从业人员受到歧视和贬低。研究表明,两性具有不同的职业生涯,比较而言,妇女的职业升迁机会比男子少得多。在美国,当今社会几乎一半的全职劳动力是妇女,但只有不到10%的老板是妇女。^⑨贝尔贝和芭恩(Bielby & Baron)等人对美国加尼福尼亚各公司两性职业的职业发展进行研究,强调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⑩1980年,美国的女性在劳动力总数中已占到42%以上,而在科学家中妇女只占18%,律师和法官的女性比例只为9%。女性工作不仅局限在服务业,而且在这个行业中兼职或工作不满1年的女性也比较多。

米克曼和特斯莉(Milkman & Townsley)指出,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现代已有部分女性进入到原先只由男性独占的精英专业领域,也有些女性在工作场所的等级分层中处于较高的职位层次,但她们始终是妇女中的少数,她们在职业与工作场所的性别隔离的等级结构中处于装点门面的(Token)状况。^⑪肯特(Kanter)指出,这种装点门面的位置使妇女处于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她们作为少数、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功女性与其他女性分割开;另一方面她们要保持这种象征性的地位,必须付出两倍于同等职位男性的努力,承受紧张、压力和孤独。在社会组织结构中,这种使人又爱又怕的处境在男女两性身上都会发生,但它的象征性意义是不同的。就男性而言,他在女性集聚的女性化职业里成为一种门面,却往往掌握着这些职业领域中的技术、管理和权力的大量资源。而女性在男性为主的职业领域里成为门面的话,却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压力大于收益。^⑫

四、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劳动及其相互关系

关注妇女的劳动就必然会关注妇女的劳动是如何被

局限在家庭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的。爱泼斯坦(Epstein)认为,男人的地位往往是由他们从事的职业或他们担任的其它公共职务的角色来界定的,而女性的地位则主要由她们的家庭角色规定。^③“女权主义的研究线索是:说明妇女在前工业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失去地位、被动地处于家庭的过程;说明日常生活中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并展开对公私领域的解构。

1. 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的妇女和家庭经济

任何历史记述都是在特殊的理论框架内的解释性再创造,近年来,女权主义者重新建构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妇女和家庭经济的图景。一些研究表明,在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无论是家庭经济还是公共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妇女都是主要的参与者。

早在1919年,历史学家艾丽斯·克拉克(Alice Clark)就探讨了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作为费边妇女小组的成员,她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妇女在家庭中角色的变迁感兴趣。她认为,工业革命前,丈夫和妻子共同工作,是一种合作式的家庭经济,夫妻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偿式的关系。妻子控制生产和销售,例如妻子管理整个农场,挤奶和出售奶酪。总之,妇女对整个经济作出了贡献,包括家务、抚养子女和家庭经济。^④

路易丝·蒂莉和乔恩·斯科特(Louise A. Tilly & Joan W. Scott)的著作《妇女、工作和家庭》分析了妇女在前工业社会中对于工作和家庭的贡献。她们利用新近发掘出来的有关家庭和人口的资料,说明在前工业社会家庭劳动的分工主要是依性别和年龄进行的。她们通过对婚龄、非法生育数量、单身男女数量人口的年龄分布来讨论妇女的工作。她们用现代的思想重新考察已有的资料,指出妇女对家庭经济的参与程度主要依赖于她们的年龄和生命周期中的经验,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在参与家庭经济方面有很大差别。^⑤随后仍有不少学者对早期工业社会的妇女劳动进行研究,其中的代表作有芭芭拉·哈娜瓦特主编的《英国前工业社会的妇女和工作》一书。新近的研究提供了更早期和更多的证据,说明了早期工业社会作为合作式单位的家庭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很难说清楚妇女在这种家庭合作式经济中的自由程度。它并不象克拉克所说的那样理

想,妇女对于共同财产、孩子监护权以及经营的控制是有限的。^⑥

C. 布茨(Christine Bose)通过对人口统计资料进行追踪研究,说明资本主义早期妇女劳动的价值。1940年以前,美国的各种统计不把以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工作列入统计之列,它掩盖了妇女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贡献。布茨通过对那些早期以寄宿制的方式参与劳动的妇女进行的调查表明,1892年,全美城市工作中,已婚妇女中有27%的人是以寄宿制的方式工作,但她们的收入只是其伙伴收入的43%。^⑦总之,各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前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女性并非象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完全呆在家中的,她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工业化进程,甚至有研究表明,早期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对女工的剥削更为残酷。

2. 家务劳动的本质

被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猛烈批判过的帕森斯曾经指出,丈夫的职业是家庭——包括妻子——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家庭分工将妇女贬抑到家庭事务中,他称家庭事务是一种伪职业(pseudo-occupation),而妇女想遵循男性的发展模式必须是在家庭结构有了深刻的变化之后。^⑧实际上,帕森斯无疑清楚地看到家务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它具有使妇女局限于家庭之中的作用。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的认识更加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强调把男人的活动范围和女人的活动范围进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是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建构,它不仅将妇女限制在家庭里,而更主要的是把她们排除在社会制度和公共事务之外。因此使女性在社会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中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依附的无声的群体。这种劳动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既使父权制得以延续和强化,又使两性的不平等得以存在和发展。

1969年,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明确把家务劳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她提出一个研究框架,扩大性地使用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把妇女的经济贡献分为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联系的两个部分,由此分析妇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形式和贡献。这是长期以来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学理论忽略的部分。在她看来家务劳动并非只是个人消费的问题,它对家庭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她把家务劳动同资本积累、社会再

生产相结合。家庭主妇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家务劳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在马克思所论述的价值公式 C （总体价值）= c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即工人工资）+ S （剩余价值），应当在可变资本中考虑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和工人的生理、心理健康等与人口再生产相关的因素。^③

1985年，贝克（Berk）指出，家务劳动与工资收入的劳动相比是一种无形的、没有报酬的劳动，是性别化的劳动。在劳务劳动女性化的同时，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由于女性要依赖于男性的报酬而出现了不平等。爱森斯坦（Eisenstein）指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之间具有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④ 萨尔顿和艾歌（Shelton & Agger）指出，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所受的双重剥削意味着妇女比男性为资本家生产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以女权主义的观点看，妇女作为私人劳动领域的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和所受到的压迫并不是男人施加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妇女的家务劳动并不简单地服务于某个男人，而是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使资本主义能够以特别廉价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再生产，并保障了足够的劳动力后备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心理功能。^⑤

妇女就业率的增加并没有改变两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妇女日益承受有酬工作和无酬工作的双重负担。哈特曼（Hartmann）根据家庭时间预算的研究指出，不管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还是有一份工资收入的职业女性，家务劳动仍然是她们的主要职责，父权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控制的地点，但家庭仍然是男人对妇女实行其父权权威的首要阵地。实质上，家务劳动呈现出的性别化状况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一个妻子“必然”要承担的责任，一个女人家务劳动的好坏象征着她是否是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因此家务劳动内涵着权力关系，是社会结构建构的一部分。总之，家务劳动反映的性别不平等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整个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建构的一部分。

3. 解构家务劳动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用解构的方法，对家务劳动

进行重新定义。弗瑞（Ferree）认为，家务劳动只是一种劳动形式而已，如果寻找一个确切的家务劳动的定义将会陷入方法论的困境，因为“家务劳动”的标签似乎可以说明各种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⑥ 女权主义对家务劳动的解构建立在对家庭的解构上，索尼（Thorne）指出，家庭的建构不仅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区分，而且家庭成为妇女经历和性别的一种建构。^⑦ 从社会性别的观点对家庭进行反思，可以展示两性不平等从日常生活领域向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

女权主义者已经看到，发达国家妇女的家务劳动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贫困地区或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妇女的家务劳动的负担远远超过城市职业妇女的家务劳动量。此外，发达国家的妇女正在雇佣着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来从事家务劳动，如“菲佣”。也就是说，妇女之间的差异在家务劳动上有着戏剧性的表现。

现代社会，女性处于双重标准和两难境地。一方面，男权社会依然要求女性固守家庭。女性即使外出工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因此通过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改变生活境况的努力，似乎只能使妇女面临更多重的社会角色的重压，她们总是要在社会角色、事业和家庭角色之间寻找平衡点。那么，妇女回归家庭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从属于家庭、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认为，男性作为“供养者”的神话正在成为过去，因为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一直存在，无非是男权社会将其置于“不可见”的状态，当妇女获得“发言权”的时候，这种状况就会改观。同时，参与社会劳动的女性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现代性和社会地位，开始自觉地要求走向社会。当今的职业构成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妇女就业的浪潮，以美国为例，战时经济的需要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导致了妇女可随时进出劳动力市场，这使妇女的普遍就业成为可能。60年代起，各国男性就业人数相对稳定，而女性就业人数迅猛增长。今天，女性劳动者出现在所有经济领域中，如技术、科学和专业领域和管理领域以及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等。1985年，对美国职业妇女的研究表明，全职工作的妇女们对生活的希望是：金钱、独立自主、控制环境和未来、为社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与其他成年人在生产工作进行互动、发挥和运用技术才能；

达到认同, 体验成长、挑战、创造力和个人的实现与尊重。^④ 全职工作的两性在期望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别。也就是说, 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目的与男性是相同的, 主要是追求优厚的薪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和由此得到的自我满足。吉根 (Mary Gergen) 认为, 女性对工作的依附可能同男性一样重要。^⑤ 通过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 一个男女平权的时代也许将会到来。

注释

① Sheila Allen: "Gender in equality and class formation",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d. Anthony Giddens and Gavin Mackenzi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37 - 138.

② Parkin, 1971, P15.

③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61 页, 人民出版社, 1973。

④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91 页, 人民出版社, 1973。

⑤ Heidi Lo Hartmann: 1979: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zillah R.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London. pp. 206 - 247.

⑥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1970. 参见《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⑦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1988.

⑧ Iris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In the Lydis Sargent (eds):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1; pp43 - 69.

⑨ Sacks K. 1974, *Engels revisited: women,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See Rosaldo & Lamphere 1974, pp207 - 22.

⑩ Eisenstein z., 1979, Introduction. 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ed. Z. Eisenstein, pp. 5 - 5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⑪ Heleith Saffioti, *women in class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⑫ Ward, K. 1993, *reconceptualizing world system theory to include women*. England P. Ed. *Theory on Gender/Feminism on Theory*. New York: Aldine DeGruyter. p. 48.

⑬ [美] 伊恩·罗伯逊著: 《社会学》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第 426 页。

⑭ R.D. barron & G. M. Norris, 1976: *Sexual divisions and the dual labour market*. In D. I. Barker & S Allen (eds.) *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Work and Marriage*. New York: Longman 1976.

⑮ Solomon W. Polachek and W. Stanley Siebert, 1993: *The Economics of Earn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⑯ H. Zellner, 1975: *The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Cynthia Lloyd (ed),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⑰ Paula England, 1984: *Wage Appreciation and Depreciation: A test of Neo - classical Economic Explanations of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 62 (March 1984).

⑱ Natalei sokoloff 1987, *What ' s happening to women ' s employment; Issues for women labor struggles in the 1980s - 1990s*. In C. Bose, R. Feldberg, and N. Sokoloff (Eds.), *Hidden aspects of women ' s work* (pp. 14 - 45). New York: Praeger.

⑲ Barbara F. Reskin, Debra B. McBrier, and Julie A. Kmec: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sex and race composition*, *Sociological Annual Review*. 1999. 25: 335 - 61.

⑳ W. Bielby & J. Baron, 1984. *A woman ' s Place is with other women*; In B. Reskin (ed.) *sex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pp. 27 - 55. Washington, Dc.

㉑ W. bielby & J. Baron, 1986. *Men and women at work: sex segreg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759 - 99.

㉒ Milkman, Ruth & Eleabor Townsly, 1994, "Gender and the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y (eds). *The Handbook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㉓ Millman, M. & Rosabeth Moss Kanter, 1975, *Another Voice. Gender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Anchor.

(下转 16 页)

这导致我提出的问题是：除了我在此文中已考察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方面外，是否还有其他尚未认识到的非预期结果的类型？如果存在着“自我失败预言”，是否也存在着“自我实现预言”？而一旦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我很快也就找到了答案。自我实现预言的一种形式就是（在我看来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对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宗教的及其他的“少数者”（他们当然有时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多数）的歧视性对待。但是此序言现在所说的已比设想的长了许多，因此，我不再更多地说明这一专题，毕竟，本书最后一章对此有详尽的分析。

罗伯特·默顿
[2000年3月]

注释

①如书中所指出的，本文尽管已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但“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于1942年初次发表时，并未明确提出奖励结构，它是直到1957年我在发表的题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篇章”（《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2卷，第635—659页）一文中才明确提出的。

②卡林·诺尔-塞蒂纳：“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全部的科学社会学？”《当代社会学》，1991年7月，第20卷，第522—526页。

③有关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扩展的最近评论，参见罗杰·法莫（Roger E.A. Farmer）的著作第二版：《自我实现预言的宏观经济学》（麻州桥：MIT出版社，1999年）。

责任编辑：张旅平

（上接55页）

④Cynthia Fuchs Epstein, 1988, *Deception Distinctions: Sex, Gender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87.

⑤Alice Clark, *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19.

⑥Louise A. Tilly and Joan W. Scott,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⑦Barbara A. Hanawalt, ed. *Women and Work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⑧Christine Bose, 1987, "Dual spheres." In M. M. Feree and B. Hess (eds.), *Analyzing Gender*. New York: Sage. p268.

⑨Parsons, 1954, p. 96.

⑩Margaret Benston, 196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 21 (4): 13-27.

⑪Eisenstein Z., 1979, Introduction, In *Capital-*

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ed. Z. Eisenstein, pp. 5-5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⑫Margaret Benston, 196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Monthly Review* 21 (4): 13-27.

⑬Myra Max Ferree, 1990: *Beyond Separate Spheres: Feminist and Family Resear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866-84.

⑭Barrie Thorne, 1992, *Feminism and Family: Two Decades of Thought*. pp1-30 in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Questions*. Barrie Thorne and Marilyn Yalom (eds). New York: Longman.

⑮Helen Moore, 1985: *Job satisfaction and women's spheres of work*. *Sex Roles*, 13, 663-678.

⑯Mary Gergen 1990. *Finished at 40: Women's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atriarch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4, 471-493.

责任编辑：张旅平